

第五屆

宋代文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邓乔彬 编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第五屆

懶展鋪枝雪未消
一畝寒雲各飄蕭
竹移解道同芳友
可任孤松獨渡凋
丙午孟冬師等題

◆ 邓乔彬 编

宋代文學
國際學術
研討會
論文集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邓乔彬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1135 - 330 - 3

I. 第… II. 邓…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20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134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排版设计中心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5.75

字 数: 1002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出版受暨南大学“211 工程第 3 期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建设项目资助。

目 录

图书传播与宋诗特色

- 宋代印刷文化史研究之一 张高评 (1)
- 南宋文人参与刻书活动初探 朱迎平 (16)
- 论宋代交通与文学之关系 王 祥 (28)
- 论宋金交聘中的南宋泛使 刘春霞 戴伟华 (37)
- “文”、“道”思想析论：从韩愈到欧阳修 杜若鸿 (48)
- 论欧阳修理性包容的文化性格 崔 铭 (59)
- 论欧阳修奉行孝道之表现 文师华 (68)
- 在沉沦中演变

- “崇宁党禁”下的文学创作趋向 沈松勤 (74)
- 学者陆游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师承 欧明俊 陈 堃 (88)
- 稼轩文学与儒家经典 赵晓岚 (101)
- 筑毬渊源述略 李俊标 (110)
- 论徐铉对宋诗的先导作用 李 贵 (125)
- 王安石与释氏的因缘及有关诗歌臆解 张 鸣 (134)
- 论苏轼学白居易诗 张再林 (145)
- 苏轼与罗浮梅花仙事 程 杰 (153)
- 周邦彦曾居官睦州，并在睦州任上两至越州诗词考证 孙 虹 任 翌 (161)
- 长淮诗境

- 《诗经》至北宋末之演变 内山精也 (169)
- 南宋馆阁与南宋诗歌 李剑亮 (191)
- 论戴复古诗歌的江湖意象与江湖气 何方形 (200)
- 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 聂巧平 (207)
- 论陆游的茶诗 中村孝子 (219)
- 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张福勋 (229)
- 论张先词在宋初词坛的位置及其通变 孙维城 (239)



北宋中期词的变化	邓乔彬 (249)
黄庭坚艳情词的佛禅观照	彭国忠 (260)
北宋词人黄裳及其尊词之功	许伯卿 (273)
李清照词的流行元素与流行状况述论	吴惠娟 常德荣 (280)
北宋的俗语	黄坤尧 (290)
论周、姜是词学的“铁门槛”	李 旭 (305)
稼轩词用调说略	崔海正 代 亮 (316)
宋词笺注之典范: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校补——以“卷五”为例	王伟勇 (322)
张炎词集在接受	
——兼论清代张氏词集手批本的盛行	邓子勉 (334)
张炎词研究七百年述论及学理反思	翦伯象 (343)
词的文化地位	仲冬梅 (362)
试论唐宋词人的休闲创作实践	谢珊珊 (371)
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反思	木 斋 (387)
宋代唱和词与词的诗化	童向飞 (399)
宋词考证五题	胡可先 (409)
唐五代词调在两宋的运用	田玉琪 (422)
宋词韵句结构分析	张仲谋 (431)
宋代“词选本”在“词典律史”建构上的意义	
——对“词史”的研究与书写提出“方法论”的省思	侯雅文 (443)
“苏李之争”:词功能嬗变的迷局与词学家的困惑	
——兼论宋代词论的两种基本观点及其演化方向	朱惠国 (467)
汪筠《读词综书后》论北宋词人探析	赵福勇 (476)
宋翔凤《论词绝句二十首》论宋词探析	王晓雯 (490)
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	王水照 (512)
论金代道教词对北宋词的继承	
——以王重阳和丘处机的词作为例	左洪涛 (527)
柳宗元散文在北宋时期的接受分歧新探(之一)	汤江浩 (537)
续骚·和陶·追柳	
——苏轼黄州辞赋经典转化与困境写真之一侧面	许东海 (544)



论杨万里的记体散文	杨理论 (559)
从模式化写作到个性化表现	
——宋代上梁文初探	路成文 (567)
《五代史平话》与平民小说	董国炎 (578)
北宋《学士年表》疏误补证	陈元铎 (586)
《二梅公年谱》及其文献价值	汤华泉 (596)
宋人“诗法”论	汪俊 (609)
再论黄庭坚诗学思想和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	由兴波 (616)
从《宋文鉴》看吕本中、吕祖谦文学思想之传承	郑永晓 (629)
《沧浪诗话》“气象”义探微	陈国明 (636)
苏轼对高丽汉诗之影响	金周淳 (658)
1980 年以后韩国的宋代文学研究概况	
——以诗、词研究为中心	金恩景 (670)
20 世纪韩国宋代文学研究现况简介 (自 1945 年至 1999 年)	诸海星 (697)
附 录	(719)
后 记	邓乔彬 (723)

图书传播与宋诗特色

——宋代印刷文化史研究之一

台湾成功大学 张高评

一、“唐宋变革”与印刷传媒

自日本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宋代近世说”，其弟子宫崎市定证成其学，于是京都学派此一中国古史分期论，影响深远。^① 陈寅恪称：“华夏文明，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研究宋史，亦以为言。推而至于傅乐成判分唐型文化、宋型文化；缪钺《诗词散论》强调“唐宋诗殊异”说；钱锺书《谈艺录》揭橥“诗分唐宋”，皆可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②

考唐宋所以变革，内藤、宫崎析论多方，殊堪采信与参照，唯变革之催化剂与驱动力为何？雕版印刷之崛起繁荣，发挥多大影响？日本京都学派及其后学并未触及。陈寅恪、邓广铭、傅乐成、钱锺书诸家推衍内藤学说者，亦未补充或论证。笔者最近关注印刷传媒对宋人学古通变、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及文学发展之影响，发现世界汉学界论著于此亦关注不多。

赵宋开国以来，实施“右文政策”，科举考试与雕版印刷为其中两大施政措施，二者体现之成效有目共睹。历来学界研讨科举考试、雕版印刷等所谓“右文政策”之论著，不可谓不多，然多专业分论，较少就印刷史、版本学、目录学，以及应试图书、学校教育、书院讲学、科举考试等所引发之印刷传媒效应作一整合研究。^③ 雕版印刷形成印本文化，印本崛起，与写本、藏本并行争辉，对于宋代之阅读接受、文学创作、诗学评论，乃至学术风尚，究竟产生那些激荡？发挥何种影响？这关系到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接受反应论与文学、文论方面之学科整合，以及印刷文化史之研究。笔者以为，上述学者所提文明造极、唐型文化、宋型文化、唐宋诗殊异、诗分唐宋、唐宋变革云云，大抵多与印刷传媒所生发之效应密切相关。推而广之，印刷传媒对宋代文学、思想、史学、经学又各有何影响？每一层面，资源丰富，却开发不多。此一学术园林，值得投注心力，耕耘垦拓。

①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王水照主编：《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总81辑，第125—171页。

② 张高评：《从“会通化成”论宋诗之新变与价值》，《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第254—261页。

③ 依笔者管见，有关论著不多，见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第二章第五节《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及大众教育的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0—32页；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代科举用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83页。两书部分章节，颇论印刷传媒对科举考试之影响，值得参考。



纸张的轻薄短小,配合雕版印刷之“日传万纸”,对于知识流通,图书传播,必然产生推波助澜之效应。就宋代而言,标榜右文崇儒,雕版印刷对于科举考试有何影响?对于书院讲学、教育普及、学风思潮、创作方式、审美情趣生发何种效应?就历史而言,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提出“唐宋变革说”、“宋代近世说”,^①是否与雕版印刷有关?就文化类型而言,王国维称美天水一朝之文化,“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陈寅恪亦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说;^②傅乐成则提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③文化演变之不同,印刷传媒居于何种地位?就诗歌而言,缪钺《诗词散论》标榜“唐宋诗异同”,^④钱锺书《谈艺录》强调“诗分唐宋”,^⑤雕版印刷是否即是其中之关键触媒?日本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曾称:“印刷术,是普及学术、普及文化的有力手段”;印刷传媒在西方之繁荣发达,促成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在宋代,印刷传媒与写本、藏本竞奇争辉,是否亦生发类似之激荡?目前学界尚未关注此一创新研究课题。

钱存训为研究书史及印刷史之权威,参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之修纂,负责“印刷术”之撰稿。^⑥有关近代中外学者对于印刷史之研究,钱氏归纳为三个主流:其一,传统目录版本学之研究。其二,图书本身发展之研究,学界论著繁夥,贡献良多。^⑦探讨日本、韩国、越南之汉籍雕版,其研究主题与焦点,亦不出上述两大系统。其三,探索印刷传媒之影响与效应,所谓“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则关注不多,值得开发。钱存训先生曾略作提示:

近年来,更有一个较新的趋向,可称为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即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进而研究其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和产生的后果。这一课题是要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科技史、文化史和中外交通史等专业才能着手的一个新方向。至于印刷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有没有产生影响?对现代西方文明和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又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印刷术对社会变迁有怎样的功能?这些都是值得提出和研究的新

① 内藤氏与宫崎市定唐宋变革说、宋代近世说,谈及影响因素大概有十:政治、选举、任官、党争、人民、经济、学术、文艺、兵制、法律等,触及印刷传媒之议题几乎没有。参考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页。

②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245—246页。

③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原载《国立编译馆馆刊》一卷四期,1972年12月;后辑入《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年版,第339—382页。

④ 缪钺:《论宋诗》,《诗词散论》,台北开明书店1977年版。

⑤ 钱锺书:《谈艺录》,一《诗分唐宋》,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页。

⑥ 钱存训,英国李约瑟东亚科技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印刷史博物馆顾问,编著有《书于竹帛》、《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中美书缘》等有关图书目录学、书史、印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之论著。

⑦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中国古代出版史料及有关论著要目》,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591页。



课题。^①

试想宋代之图书传播,除传统之写本、抄本、藏本外,尚有“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化身千万,无远弗届之雕版印刷(印本图书)。图书传播之多元,尤其是印刷传媒之激荡,究竟生发何种文化上之效应?学界论著用心致力于此者实不多见。^②相对于谷登堡(Gutenberg Johann, 1397—1468)发明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之兴起,多攸关民生日用,如日历、医药方剂、宗教经卷、图腾崇拜、咒语符录等社会之殷切需求。其基本影响为书价的降低和书的相对平凡化。另外,还影响到阅读实践的改变,加强了一种古老的变革,诸如“不同的稿本不再被采用,著作法规也在逐渐改变,文学领域进行重新组织(有关作者、文本和读者)”。

印刷的发展和通俗化,改变了阅读的环境。正如蒙田所云:“为了醉心于狂热的阅读而沉浸书中,任由自己或遐想,或创新,或遗忘。”^③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印刷史学者马尔坦(Henri - Jean Martin)合著《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强调:“印刷带动文本的大规模普及”,“这显然是种变迁,且变的脚步还颇快”,同时提出印刷书促成文化变迁结果之种种推测:

大众究竟需要书商与印刷商提供他们哪类书刊?印刷究竟令传统的中世纪文本普遍到何种程度?这些旧时代的传承物,又被印刷术保存住多少?印刷机骤然突破了既有的智识作品保存媒介,是否也助长了新的文类?或者情况正好相反,是早期的印刷机大量印刷了许多传统的中世纪书籍,才让这些作品的寿命意外地延长数十年,一如米什莱所言?我们将试着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④

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蔚为中古欧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语文之激荡,被喻为“变革之推手”。尤其是在恢复文本原貌、摆脱前贤解说、创新增补诠释方面。相较于

①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一章绪论,四《中国印刷史研究的范围和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钱存训于1983年6月为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出版作序时,关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是否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起初是持否定和保留态度的。如云:“东西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印刷术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差异。在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和知识普及方面,可能作用相似;至于对社会、思想上的变革和印刷术本身的发展方面,东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能背道而驰”;又云:“至于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其他国家,印刷术的使用,在社会和思想上,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反而促进了文字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成为维护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不过,最后又总结说:“但这一问题,因素复杂,必须对学术、思想、社会等各方面在印刷术使用以前和以后,多找证据,根据史实,深入分析和比较,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钱存训博士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② 有关印刷文化史之研究,管见所及,有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术在中国社会和学术上的功能》,第356—358页;清水茂著,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印刷术的普及与宋代的学问》,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8—99页。露西尔·介(Lucile Chia):《留住记忆:印刷术对宋代文人记忆和记忆力的重大影响》,《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思想家》II),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498页;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东坡乌台诗案”考——北宋后期士大夫社会中的文学与传媒》、《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292页。

③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Histoire DU Livre*),第六章,4《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页。

④ 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一《从手抄本到印刷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249页。



雕版印刷在东方,传媒效应促成经典研究的复兴,学术和撰述风尚之改变,有殊途同归之妙。

士人的阅读期待、审美品位和印刷书籍之品类,是否相互为用?印刷书之为传媒,对于宋代教育之相对普及,影响程度如何?唐代及前代典籍经雕版流传后世者,存留多少?印刷传媒引发知识革命,是否催生新兴的文类?或者更加保固传统文体,而蔚为历代文学创作之典范?凡此种种,覆案宋诗、宋代文学及宋代诗学之研究,多可作为对照、触发。雕版印刷在宋代之崛起繁荣,是否也有类似之效应?钱存训所提“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进而研究其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和产生的后果”,这一系列的创新研究课题,正是笔者草撰本文之企图。筚路蓝缕,文献不足,此创新研究课题必然面对之共相,其中艰难实多,请学者方家多多指正。

二、印刷传媒对宋诗特色之推助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渐渐运用于图书典籍之刊刻,加上北宋右文崇儒,有心推广印本,科举考试、书院讲学、佛道说法、作诗习文又皆需求丰富图书,于是因时乘势,雕版印刷与古籍整理、图书流通、知识传播结合,供需相求,遂形成“印本文化”(又称“雕版文化”)之繁荣昌盛。论者称:南北两宋三百余年间刻书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①其盛极一时,致天下未有一路不刻书,国子监刊刻经书史籍,固在宣索赐予,兴教济众,而州、县、郡、府学、书院亦多刻书牟利,或期布之四方,有所矜式;资鉴致用,度人金针。而书坊宅塾亦争相刻书,所谓“转相模倣,以取衣食”。因此,两宋官私刻书最盛,号称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②知识的传播媒介从写本转为印本,不仅书籍加快制作速度,书籍复本增多流通数量,而且对知识信息之传播交流,图书文献之保存积累,都有革命性之影响。印刷术号称“神圣的艺术”,西谚有云:“印刷术为文明之母”,诚哉斯言!雕版印刷与商品经济之密切结合,促使宋代文化蔚为华夏文明之高峰。宋型文化之所以与唐型文化不同,笔者以为,雕版印刷之繁荣,促成知识革命,形成尚理、重智、沉潜、内敛之士风与习性,为其中之关键。

雕版印刷之繁荣与宋代文学之发展,两者共存共荣,交相影响,也自然形成一个反馈系统。唐代文学之辉煌灿烂,清代蒋士铨曾感慨“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宋人面对此种困境,因应策略,首在汲取古人,尤其是唐人之优长,作为自我安身立命之养料;既以学古学唐为手段,复以变古变唐为转化,终以自成一家的目的。从学习优长,到变古变唐,到自成一家的,每一历程都牵涉到大量书籍阅读,方能因积学储宝,出入古

①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第四章第一节《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插图珍藏增订版,韩琦增订,《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44页。张高评:《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传媒之控制研究》,《成大中文学报》第20期(2008年4月),第171—210页。



今,而斟酌损益,新变超胜。笔者以为:雕版印刷之崛起与繁荣,所触发之图书流通、知识传播效应,是宋代文明登峰造极之推手,是宋型文化孕育之功臣,是“诗分唐宋”之重要触媒,是“唐宋诗之争”公案中之关键证人。笔者深信:就宋诗特色之形成来说,其中自有雕版印刷之推波助澜、图书流通之交相反馈诸种外缘关系存在。钱存训研究中国印刷文化史,论断“印刷术的普遍运用,被认为是宋代经典研究的复兴,以及改变学术和著述风尚的一种原因”^①。循是可以想见,宋诗以外,词、文、赋、四六及其他宋代文学门类,及宋代经学、史学、理学、佛学禅宗、道家道教,标榜会通、集成、新变、代雄者,要皆与雕版印刷之繁荣、图书之流通有关。^② 北宋以来,印本与藏本、写本并行,图书信息量必然超越盛唐、中晚唐与五代;至南宋末理宗、度宗时,印本逐渐取代写本,对于阅读接受、学习定向、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甚至文化转型,多有影响。至于影响之层面有多广大,有多深远,宋代有哪些学术门类最受冲击,都有待进一步考察与论证。

古籍整理、雕版印刷、图书流通、阅读接受、知识传播,五者循环无端,交相反馈,形成宋代印本文化之网络系统。就宋诗追踪典范,撷取优长,到新变代雄,自成一家之历程而言,近程目标是学古学唐,表现方式有三:其一,编辑唐人别集;其二,评注唐诗名家;其三,宋人选编唐诗。其次,为阅读唐诗,撰成诗话笔记,或读诗(书)诗,推崇唐诗宗风,分享读诗心得。于是有关唐人之别集、评注、诗选、诗格,皆先后雕印,攸关唐代诗学论述之诗话笔记亦次第刊行,雕版印刷提供宋人阅读、学习、接受、宗法唐诗之诸多便利途径。宋人作诗之学唐变唐,宋代诗话笔记之提倡学唐变唐,得印本图书流通之便利,方能功德圆满,水到渠成。再次,诗话笔记提倡学唐变唐,借雕版印刷之流传,又反馈到诗歌之创作中。无论推崇苏、黄,宗尚江西,或标榜盛唐,师法唐诗,诗学中丰厚的信息量,必然影响到宋诗诸家之宗唐或宗宋旗向。就文学作品之召唤结构而言,所作诗歌之诗思、语言、风格、意象、主题和技法,每一阶段从开始到完成,宋人多可以经由阅读接受,进行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所谓“有所法而后成,有所变而后大”。雕版印刷在宋代发展繁荣后,士人对图书之阅读接受,除唐朝以来之藏本、写本、抄本外,又多出量丰质高之印本图书。此一新兴之印刷传媒,对于阅读接受、创作论述之激荡,可谓之“知识爆炸”,差可比拟。宋诗以师法唐诗之优长为过程、为手段,以新变代雄、自成一家为终极目标,传承与开拓一举完成,在在皆以唐诗为参照系统,很难不受印刷传媒、图书传播之影响。因拜雕版印刷之赐,印本购求容易,图书流通便利,宋人之学古通变、新变自得方成为可能。

推而至于宋代文学其他门类,如文、词、辞赋、四六、诗话、词话、笔记、评点以及类书,由于图书传播,尤其是印刷传媒之繁荣昌盛,而有丰厚之博观厚积,约取薄发,可能促成文体之化成、内容之会通、技法之讲究、审美之嬗变,于是文分唐宋,词分五代北宋南宋,而两宋之辞赋与四六,自与四唐不同。其中,文献大量汇集,便捷传播,造成文艺

①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② 张高评:《印刷传媒之崛起与宋诗特色之形成》,《成大中文学报》第18期,第39—76页。



创作与批评相互为用,相辅相成。诗话、词话、笔记、评点不吝分享阅读心得,提示创作经验,归纳艺术规律,表述美学主张;作家阅读、接受、饱参、妙悟、转化体现于作品中。于是文艺批评与创作交相影响,各自反馈。凡此,皆拜公私藏书之丰富,图书传播之多与便利所赐。科举取士加上雕版印刷,贯彻宋朝右文崇儒之政策使然。

雕版印刷在宋代之崛起,形成印本文化。于是宋代之图书传播,除隋唐以来传统之写本、抄本、藏本外,又有“易成、难毁、节费、便藏”之印刷传媒,其字体美观大方,装帧赏心悦目,其数量化身千万,其传播无远弗届,对于阅读、创作、评论、著述,必有影响。宋代诗话、笔记、文集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多有一鳞半爪之提示,而会通化成,转相发明,以之探讨文学之流变、史学之繁荣、经学之复兴,乃至理学之特起,唐宋变革诸课题,正有待乎来者。

有鉴于此,笔者乃尝试选择“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为研究主轴,旁及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问题,完成三十六万言之论著。^①研究文本,以北京大学《全宋诗》为主,参考宋代诗话、笔记诸诗学数据,佐以《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诸印刷史料,并借鉴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阅读学、接受反应文论,以考察印刷传媒对宋代诗人“阅读与接受”之可能影响。全书分十二章,除绪论、结论外,大抵分为四大领域:其一,宋代雕版印刷之崛起与繁荣,政教指向与传媒效应;其二,诗集选集之雕印刊行与宋诗之学古会通,新变自得;其三,两宋读诗(书)诗之嬗变——从学唐变唐到比兴寄托;其四,从史书之刊刻流布,论南宋咏史诗之反馈与转折。印刷术被誉为“神圣的艺术”,又号称“文明之母”,为普及教育与文化之必要手段。雕版印刷在宋代的发展,学界推崇为“黄金时代”;相较于活字印刷术在西方扮演“变革之推手”,印刷传媒在两宋发挥之影响,是否亦促成知识革命、助长“诗分唐宋”文风之形成?今将各章研究主题与学术心得撮举于后,以便考论与观览。

(一)宋代雕版印刷之崛起与繁荣,政教指向与传媒效应

梳理宋代印刷史料,讨论雕版图书在宋代之发展,有正反两极之力量,相互拉抬牵引:其一,是朝廷及民间对雕版印刷之推广与普及;其二,是朝廷对书坊雕印图书之监控与禁毁。雕版印刷价廉物美,传播便捷,既有利可图,又切合朝廷教养之意,于是右文政策获得推动,印本文化于焉形成。印本流通,与写本、藏本竞妍争辉,影响传播与接受;古籍整理之蓬勃,图书雕版之繁荣,促成宋代文明之发达。雕版印刷之崛起,对于学术思潮、文化文明究竟生发哪些效应?传世文献多语焉不详。唯朝廷对印本图书之监控,征存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大抵有泄露机密之虞者、有摇动众情之虑者,多实施看详禁毁。或因文集日记牵涉威信、机事、异端、时讳,亦毁版禁止;类编之科举用书,忘本尚华、便利检阅怀挟,助长侥幸者,亦禁止施行。从书肆雕版印刷之“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又动辄遭受监控禁毁,可推想印本之化身千万,

^① 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版,第1—591页。



无远弗届,深入人心,所生发之种种传媒效应。^①

由于雕版图书有“易成、难毁、节费、便藏”诸优长,数量上可以化身千万,空间上又能够无远弗届,颇能满足宋代士人之博观厚积,学子之科举应试,供需相求,于是蔚为宋代雕版印刷盛况空前。刻书印卖有利可图,于是各地纷纷设立书坊,以至全国未有一路不刻书,对学风文教之影响,可谓深远广大。图书之刊刻,藏书家或兼理校书刊书,促成校雠学之兴盛;雕印之选择,关系传播与接受,往往与文风思潮相映发;宋人选刊唐诗宋诗,志在学古通变,自成一家;印本既多,世不知重,读书法之倡导遂应运而生。至于印本图书之繁荣,引发五大效应:其一,印本、写本争辉,促成知识革命;其二,州学书院刊书,提供教养自助;其三,运用公帑,借以刊书赢利;其四,民间侵版,或任意删节,擅自刊行;其五,保护版权,则申明约束,禁止翻印。雕版图书之繁荣,亦由此可见。^②

(二) 诗集选集之雕印刊行与宋诗之学古会通,新变自得

宋代雕版印刷崛起,图书传播便捷,宋人深信读书博学有助于下笔有神,于是博观约取、能入能出,奉为阅读与作诗之圭臬。宋诗“破体”、“出位”之现象,着眼于“异场域碰撞”,创造性之合并重组,引发“梅迪奇效应”,对于宋诗特色之生成,自有推波助澜之作用。唐诗之辉煌灿烂,名家辈出,提供宋人典范追求及诗材储备之便利。宋人致力编选刊刻唐诗总集选集,作为学唐变唐之触媒,或标榜学李宗杜,或推崇意新语工,或凸显诗画相资,或宗法中晚唐,或标榜盛唐,或兼采唐宋。宋诗从阅读而宗法,因新变而自得,于是继往与开来同时完成。^③

宋人整理雕印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唐代诗文集以及陶渊明集,作为典范之观摩与学唐变唐之触媒;加上写本、藏本之流通,图书信息之丰富多元,于是宋人从阅读、接受、饱参,进而宗法、新变、代雄,将传承优长与开拓本色毕其功于一役。印刷传媒之崛起,图书流通之便捷,对于宋诗特色之生成,自有推波助澜之效应。推而广之,对于南宋以来张戒、严羽所斥“奇特解会”,明清宗唐诗话所讥“非诗”习气以及一切“唐宋诗之争”课题,钱锺书所提“诗分唐宋说”,乃至日本内藤湖南所倡“唐宋变革说”,陈寅恪、傅乐成所谓宋型文化、文化造极云云,多可从宋代之雕版印刷切入,作为诠释解读之试金石。^④

骚人墨客之审美品位,攸关图书市场之好恶取舍,而图书版刻质量之优劣高低,大抵与诗集选集传播接受之宽广度有关,更与宋诗之发展嬗变桴鼓相应。宋诗名家大

① 张高评:《雕版印刷之繁荣与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印本之普及与朝廷之监控》(上),《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1期,高雄丽文文化公司2005年版,第1—36页。

② 张高评:《雕版印刷之繁荣与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兼论印本图书对学风文教之影响》(下),《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2期,高雄丽文文化公司2006年版,第1—44页。

③ 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之学唐变唐——博观约取与宋刊唐诗选集》,《成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7年4月),第1—44页。

④ 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之新变自得——兼论唐人别集之雕印与宋诗之典范追寻》,中山大学中文系《文与哲》第10期(2007年6月),第227—270页。



家,如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为宋诗特色之先导;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宋诗宋调之建构;陈师道、陈与义、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见江西诗风之嬗变;邵雍、朱熹诗歌,得理障理趣之消长;刘克庄、戴复古二家,知宋诗宋调之变奏。凡曾影响当代、流传后世者,其图书传播除写本、抄本外,又皆有颇多之雕版印本作为图书传媒。宋人选刊宋代诗文总集,从审美品位与商品经济,亦可考察宋诗体派之流衍,如《西昆酬唱集》之于西昆体,《三苏先生文粹》、《坡门酬唱集》之于东坡体,《江西宗派诗集》之于江西诗派,《四灵诗选》之于四灵诗派,《江湖集》前、后、续集,《两宋名贤小集》、《诗家鼎裔》之于江湖诗派,《瀛奎律髓》之于一祖三宗。^①

(三) 两宋读诗(书)诗之嬗变——从学唐变唐到比兴寄托

考察《全宋诗》前三十册所载读诗诗,诗人之阅读接受、审美意识,宋人之学古通变,宋代之诗学典范,甚至宋诗之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凡宋代诗话讨论之诗学议题,于此多可以考求得之。就北宋诗人之阅读定式而言,白居易、韩愈、晚唐诗人之诗集于宋代刊本藏本多,传播所及,选取作为阅读诗集者亦较多,或作为粉本,或作为悟入,或作为意新语工之触发,宋诗之学唐变唐,此中颇有体现;阅读李白诗集者虽亦不少,却多作为“李杜优劣论”之表述。陶渊明与杜甫以人格美与风格美兼备,被尊奉为宋代诗学之最高典范。终宋之世,陶集杜集雕印版本繁多,供需相求,理有固然。考索北宋读诗诗,读陶、读杜之诗篇,亦有如实之反映。^②

本研究考察陆游阅读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王维、白居易、元结、许浑、韩偓及梅尧臣、林逋、魏野、范仲淹、黄庭坚、吕本中、苏过诸家诗之情形。其创作策略,或感物兴情,或托物寓情,其写作方式大抵以“咏怀写志”为主,偏重唐音之“比兴寄托”。至于尊崇典范,作为学古通变之圭臬,则与北宋读诗诗先后一揆。陆游身为藏书家,万卷具眼,作诗却标榜诗家三昧、诗外工夫,活法、换骨,故虽博观诗集诗篇,要皆作为比兴之触发、悲愤之媒介,诗学之体现,且供其“忧时悯己”之慨叹而已。可见,陆游读诗诗已与两宋其他诗人略有差异。盖书为诗用,不为诗累,故驱遣发越如此。^③

(四) 从史书之刊刻流布,论南宋咏史诗之反馈与转折

宋代尚文,史学繁荣,雕版流行,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家因时乘势咏史,除传承六朝以来体制外,又往往借读书、读史以咏史,借乐府旧题以写志,借出使边塞登临而怀古;其他,因题画、缘感兴而咏史者亦不少。考三大诗人关切之主题,以六朝隋唐以来历史之成败兴亡为核心,旁及人物之臧否,人才之用舍,政俗之讽喻,其要归于资鉴。至于三大家之咏史类型,以史为咏,借古讽今较多,櫟括史传最少;别生眼目,独辟

① 张高评:《宋人诗集选集之刊行与诗分唐宋——兼论印刷传媒对宋诗特色之推助》,东华大学中文系《东华汉学》第7期(2008年6月),第67—128页。

② 张高评:《北宋读诗诗与宋代诗学——从传播与接受之视角切入》,《汉学研究》第廿四卷第二期(总第49号,2006年12月),第191—223页。

③ 张高评:《从资书为诗到比兴寄托:陆游读诗诗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第283—312页。



蹊径,最有特色。本文援引陆、范、杨三大家 50 余首咏史诗为例证,得出视角转换、遗妍开发、翻空生奇、微辞嘲弄、历史论衡五者,为咏史诗别生眼目之五大途径。咏史诗之注重史学史识,会通历史与文学而化成之,自是文人之诗,非诗人之诗,亦由此可见。^①

对于宋诗特色之生成,宋诗宋调与唐诗唐音之同源异辙,印本繁荣自是其中转化之关键与触媒。本文选择创作历程较受图书阅读、版本流传诸因素影响之咏史诗作为论证之视角;时代圈定印本业已取代写本之宋末元初,诗人则讨论理学家陈普,关注其身处闽学荟萃、书院林立、刻书繁荣、藏书丰富之福建地区,讲学宗法朱熹“格物致知”一派,以此背景考察其《咏史》组诗 362 首,作为研究之文本。分诗篇自注、连章逞巧、资书以为诗、翻案生新四方面举例阐说;从而可见雕版印刷影响诗歌体制、语言、技法、风格之一斑。文学研究,可以整合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而一之,本文权作嚆矢。^②

对于宋代士人而言,雕版印刷改变知识传播之方式和质量,进而影响阅读之态度、方法和环境,乃至创作之习性、评述之体式、审美之观念和学术之风尚,对宋代之风士习颇多激荡。因应右文崇儒政策,科举考试、书院讲学、教育普及、著书立说,皆因印刷传媒之推助,而有加乘之效果。由此观之,印刷传媒堪称唐宋变革之催化剂,宋代之为近世特征之促成者。本文侧重探讨四部典籍之刊行与两宋文明昌盛之可能关系,宋代印刷传媒繁荣、图书流通便捷,对于“诗分唐宋”之可能影响,有别于目录版本学之论述,亦不同于书籍纪传体之研究。对于学界探讨唐宋变革、宋型文化、诗分唐宋、宋诗特色诸课题,或有参考触发之价值。^③

《文心雕龙·知音》阐述文学作品与读者鉴赏之关系,其中述及读者“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是以同一作品可能因慷慨、蕴藉、浮慧、爱奇之审美性格不同,接受反应亦随之差异。好恶取舍之间,诚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宋人姚宽《西溪丛语》讨论唐人选李白、杜甫诗,列举《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唐诗类选》、《极玄集》,对于李白、杜甫诗,或选或不选,以为“彼必各有意也”,诚然。本文考察宋人选唐诗、选宋诗,宋刊唐人宋人别集,或作为学唐变唐之触发,或作为新变自得之借镜,爱憎取舍之间,亦不异刘勰与姚宽所言。抑有进者,宋人雕印刊行上述别集诗选,审美趋向虽“彼必各有意”,然多统归于宋诗之典范追寻以及追求自成一家之苦心孤诣中。

再就读诗(书)诗言之,两宋诗人之阅读定式大抵与典范尊崇,作为学古通变之圭臬有关。六朝四唐诗人膺选为宗法对象者,于宋代流传之刊本藏本亦多;唐人而开宋调者,无论北宋诗人或陆游之阅读,亦多广受青睐。唯陆游读诗诗以咏怀写志、比兴寄

① 张高评:《史书之传播与南宋咏史诗之反馈——以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例》,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总第 10 期(2007 年 12 月),第 121—150 页。

② 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南宋咏史诗之嬗变——以遗民陈普咏史组诗为例》,中山大学《文与哲》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第 313—356 页。

③ 张高评:《印刷传媒之崛起与宋诗特色之形成》,《成大中文学报》第 17 期(2007 年 12 月),第 39—76 页。



托为主,与北宋读诗诗勾勒阅读对象之人格与风格不同。至于咏史诗,以史为咏,别生眼目,固凭借史书之传播及诗人之博观厚积;即如陈普咏史组诗为数众多之自注、组诗、资书为诗、翻案为诗,亦与福建刻书繁荣、藏书丰富有关。试考察国子监及官方书坊之刊刻四部典籍,结合目录学、文献学之印刷史料,可以推想:印刷传媒之崛起繁荣,增进图书传播之质量,对于宋诗特色之形成,自有推波助澜之功。

三、印刷传媒与“诗分唐宋”

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何以是华夏文化之登峰造极?何以宋代具有近世的特征?何以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不同?笔者以为:其中因素,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已作若干提示,现代汉学界唐宋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亦多所发挥;唯对雕版印刷之崛起,印刷传媒生发之可能效应,缺乏应有之关注与考察。笔者以为:印刷传媒之效应,是促成“宋代近世”、“唐宋变革”之关键因素。学界不妨以此观点考察宋代之经学复兴、史学繁荣、宋学创发以及文学门类蜂起多元,甚至诗话笔记崛起。林林总总,笔者以为,多与两宋“未尝一路不刻书”有关;印刷传媒效应的反馈,可看作“唐宋变革”之触媒转化剂。

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对于唐宋诗之殊异,曾作较明确之列举;对于宋诗之特色,亦作概括式之论述。所谓“唐宋诗殊异论”以及因此而导致之“宋诗特色”论,若持印刷传媒之作用与效应观之,无不怡然理顺,涣然冰释。缪钺概论唐宋诗之殊异,似乎楚河汉界、判然有别。姑且不论唐宋诗之间,尚存在源流、正变、辨体、破体以及传承开拓诸问题,就缪钺所提宋诗特色,为“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为“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为“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云云;所谓情思深微、气力收敛、声响清冷、词句朴澹、其美在意态、其味重隽永云云,衡以钟嵘《诗品》之诗观,唐诗率由“直寻”,宋诗多为“补假”;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评宋诗、斥江西,以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龚鹏程论宋诗,有所谓“知性的反省”、“转识成智”、“技进于道”诸特征与型态,^①足与缪钺所论相互发明。笔者以为:凡此,要皆为印刷传媒之发用与效应。

对于唐宋诗之异同或宋诗特色,笔者曾研究清初150余年唐宋诗之争,发表《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以“宋诗得失论”为考察重点》,其中提及宋诗特色,略谓:

宗唐诗话论宋诗之习气,如出奇、务离、趋异、去远、矜新、变革、疏硬、如生、尖巧、诡特、粗硬槎牙、夺胎换骨等等,诸般“不是”,就“菁华极盛,体制大备”之唐诗而言,自是新变代雄的一种手段,即是雅各布森、姚斯、什克洛夫斯基等学者所倡,

^① 龚鹏程:《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技进于道的宋代诗学》,详见张高评主编:《宋诗论文选辑》(一),高雄复文书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34—215页。